

城北主题散文

城北

主题散文



无糖岁月

徐城北 著

学出版社

城北



WUTANG SUIYUE



城北主题散文

无糖岁月

徐城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61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曹 春

城北主题散文

无糖岁月

徐城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5 字数 177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83-9/I·192

定 价:16.2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自序

1996年底，北京一所街道医院。在一间由医疗器械室临时改成的病房中，父亲孤零零地睡在当中的病床上。整间房子就一只小方凳，来了亲友请亲友坐，没有亲友时我就坐。我把背部倚靠在并不清洁的墙壁上，还遗憾凳子不能像椅子那样伸出两只扶手，好让我扶上一扶……这一年我54岁，已然在医院中熬过了许多天。

事实上，我断续在医院已熬过了十五年——1979年年底，我刚由外地调回北京，只在中国京剧院“无负担”地工作了一年。随即而来的，就是母亲患脑血栓病倒，七年半之后去世。在母亲去世的前三年，父亲相继病倒，也是同一个病，他一直挺到了这一刻——已是母亲去世后的第八个年头。

医生查房。我挣扎站了起来，医生扫我一眼，“你——”

我明白那眼光中的潜台词：“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连站起来的劲儿都没有了？”

医生叫我也去验血，并且挑明了说：“你肯定身体有病……”

我“挺”着说：“没病。我有十年——没进合同医院啦。”

“甭逞强。化验出了结果再看。”

……

对出了结果的化验单，医生扫了一眼：“你有糖尿病。等这儿——”他而扫了一眼病床上的父亲，然后放低声音说，“等这儿——完了之后，回你的合同医院看病去吧。”

说最后这句话时，语气虽然淡淡的，但充满了理解。但对于我，这句话无异于法官的判决——我刚刚在自己喜欢的岗

位上工作了一年，怎么就会出现这个病？我怎么早些就没想到？我怎么早些就没防范？

稍后，合同医院的大夫对我说：“病不算重，但肯定是‘戴了帽子的’……”

这“戴帽子”三个字，医生或许是一种调侃，或者是一种习惯了术语。但对当过二十多年的“右派子女”的人，听上去很刺激。

医生肯定不会知道——从“文革”后调回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和父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一阵儿，父母获得“改正”，恢复了党籍，当年的误判已经推翻，可我受到的牵累却无处可以说理。我当时的处境很窘——比起京剧院里的同龄人，我的工资要低上四、五级。同事都有了一、二十年的工龄和经验，而我却是“一张白纸”。对这一切，我只能沉默以对，只能以百倍的努力去追赶。

我这样努力了。终于在十多年后，我的工资、职称才和同龄人基本“扯平”，我的业务能力也“扯平”甚至“超过”了。这时候我正干得起劲儿，从感情上认为自己没病也不能病，自己不但刚刚完成了当时之“我”，并且还设计了未来之“我”。我刚寻找到下一步（直至退休乃至生命终结）的业务方向和业务计划。这方向和计划都是再三筹画才形成的。如果干好了，兴许一好百好；如果干不好，难免功败垂成。

也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疾病却纠缠上身儿来了！真是可厌，也真是无奈。

——幸好病还不重；

——幸好家人和朋友现身说法，给我很大的鼓舞；

——幸好我不必“坐班儿”，任务和工作时间可由自己安排；

——幸好我精于“计算”，不断调整各种矛盾中的关系；

——幸好……

我才这样活到了今天。

——本来是最爱吃糖和肥肉的，现在严格忌口。

——本来和梨园武行哥们儿碰坏，已经有了白酒三两的量，现在戛然而止。

——本来是撒开了干活儿的，现在时刻注意节制自身。

——本来是最无拘无束的，现在得从点滴小事上防范自由主义。

“无糖岁月”，就这样残酷地摆在面前。一个崇尚自由的人，必须从失去种种大自由的前提下，去寻觅那还有点滴可能“寻找回来”的小自由。

幸亏我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闲云野鹤，才使坏事在我身上有可能变成好事。我可以借助剩余下的一二十年光阴，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挑战自己，做一些从肌体到精神方面的实验。我把这些实践记录下来，或许能给同时代人以少许的启发。

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作者

1998年6月18日

目 录

自 序	1
十年没进合同医院	1
十六人病房	2
口述文章	4
枣树	7
费大成	10
怕见病恹	13
工作是美丽的	16
单间儿	19
认病不认命	23
诸多师友如是说	26
黄宗英对我说	27
[附录]·《垫补——〈水滴石穿〉代序》·(黄宗英)	30

袁世海对我说·····	32
邓友梅对我说·····	36
余秋雨对我说·····	39
[附录]·《〈梅兰芳百年祭〉序言》·(余秋雨)·····	42
苏叔阳对我说·····	45
黄宗江对我说·····	47
[附录]·《〈品戏斋夜话〉序》·(黄宗江)·····	50
 什么才是“活着” ·····	 52
永定河畔定终身·····	53
附:京剧《骆驼岭》第七场片段·····	59
略说“吃里爬外”·····	61
难忘“品”字·····	64
情满荒山·····	67
天生我材必有用·····	69
沧桑阅尽话悲欣·····	71
百无一用是书生·····	73
 从糖到“糖” ·····	 76
遗传基因·····	77
超越甜俗·····	81
程砚秋、荀慧生之比较·····	84
饮食男女:这世界以“糖”诱人·····	86
 啃西瓜皮时的思考 ·····	 89
略思“不可逆”·····	90
能否不吃西药·····	92
学做“滚刀肉”·····	95
太费事就算了·····	98

积累人生大经验	101
又写旧诗	102
钟爱空白	108
升华寂寞	111
闲来读帖	116
使用两手	119
关注导游	122
远看足球	124
徘徊在文人与艺人之间	128
世纪末与 UFO	132
以“三合一”上保险	135
西医向红丁	136
中医吴宗宁	140
儿时伙伴沈宽	143
难在“三合一”	146
麻烦频仍	149
老牛破车	150
谁是赢家	153
谁来管管“三不管”	155
愁对塔楼	158
磨剪子随想	161
上苍看着我	164
难言遗憾	165
重温习字	170
梦回“六子谣”	175
尘埃的忆念	180

寻开心	182
适度犯忌	184
怀柔好地方	187
甘愿“三陪”	190
永字八法	193
圆梦武当	195
前门与老字号特区	201
踩着鼻子上脸	203
托梦	214
何日得宽余(代后记)	217



十年没进合同医院

十五年来，我熟悉了北京诸多的大医院。父母病重时，医生要家属在病房陪床；病情缓和时，则连探视也有种种限制。你要真想进去，就得在心里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道路图——得知道从哪儿上再从哪儿下，以及如何左弯右绕，才能躲开护士的拦阻……开始一度兴奋，认为这也算一种“生活”。久而久之，病房中的那种味道，我一闻就恶心。

从此怕见病人和病态，力求少去医院。我在守护父母之外的剩余时间当中，还得奋力工作，还得奋力追赶在我前头的同事。再说，国家把我从外地调回北京，也不是光为了增加一名“特护”的。

于是，我有十年没进自己的合同医院。

十六人病房

母亲刚患病时，住过十六人一大间的病房。那是西城白塔寺的人民医院，母亲的合同医院。母亲已经“改正”，也算是“高干”了，但女病房中的单间和双人间本来就少，况且都不空，母亲脑血栓发病又急，只有先住下来抢救再说了。

这是一间圆形的大病房。十六位病友都头对窗户，脚对屋子正中的“圆心”。这人民医院当初是德国人盖的，医院的房子自有其布局，这圆形房子肯定属于一种“不住人”的公众场所。后来因人民医院承担的治疗任务越来越大，病房也显得越来越局促，才被迫改成不分科别的混合女病房。

病房有三个门儿，医护人员和陪床的家属川流不息出出进进。用纯医疗的观点看，这儿根本不适合作为医疗之用，更不宜把各种病症和各种科别的病人放在这里“一锅熬”。但是没办法，医院没办法，病人就更没办法了。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在这儿是救命第一，把命先救过来，您回家歇着去。您前脚走，又有新患者踩着您的鞋印睡到您的这张病床上来。

母亲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天之后，就用她那富有同情心（甚至是悲天悯人）的目光观察这十六人大病房了。

她怕看患者的病态，她不同情怕死的患者。她不管不顾地说：“抗战时，我在重庆见过死人，那是日本飞机轰炸之后……”满屋子人对她侧目而视。她毫无所觉，又充满怜悯地注视那些陪床的家属：“怎么能由男性家属进入女病房陪床呢？”她是在黎明的曙光刚刚照射到窗户时，这样对我说。忽然她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似的，“怎么，昨天夜里是您在这儿值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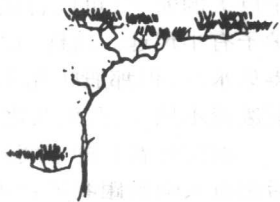
我笑笑，指了指大病房中的患者和陪床：“大家又经过了一夜……”不久我就走了，有替班的人来换我。这天剧院中有会，讨论别人新写的京剧剧本。我去就是听，听也是学习。当时我刚进剧院，领导没给我“死任务”，就要我多看戏，多听别人谈戏。现在家里有病人，根本没要求我一定去开会。后来，当我骑车进剧团去听会时，大家都愣住了，随即就是招呼与寒暄。

母亲抢救过来没住几天，就闹着要出院。医生劝她不要焦躁，说再等几天，女病房的双人间兴许就有空床，母亲不干，硬是回了家。她让把九寸小电视摆在她床脚对面的五斗柜上，这样她坐在床上时，就可以用看电视消磨时间了。

她最爱看俞振飞演的昆曲。“昆曲多美！过去居然我没留意……”

我们劝她多锻炼，她不予理睬。只是嫌九寸电视“没颜色”，屏幕也“小了点”。不久，有戴解放军帽徽的亲戚去福建，偷偷花了两千块钱，去到村儿里买了一个十四寸的彩色电视。为什么是去“村儿里”呢？那儿是侨乡，容易有舶来品，绝对是真货，两千块钱贵点儿，但母亲养病中需要，也就买下了。

母亲不注意锻炼，她以后断续还要住院。以后，她先后住过四人间、三人间和双人间，但她一直没忘那个十六人病房。



口述文章

母亲数次住院，她自己都未必知道，给机关的老干部处添了多少麻烦。因为合同医院的病床有限，不是想住院就正好有床——尤其是女病房。所以你就得等，得耐心等床。等床的人是四面八方，各人使各人的路子去催去争取。母亲的单位是全国政协机关，单位“大”不假，但不能有任何“真格的”，只能有老干部处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往医院跑，当面反复说，人家爱搭不理。冷遇受多了，政协跑的同志也感到累了。再说，政协老干部处要管一大批老干部，母亲行政级别也就是刚够格。你还要人家怎么样呢？

我们家里也实在够惨的，睡觉用的床，还是解放初期父母单位里的——那时公家给你配备家具，算是“借”，逐年扣折旧费。家具以后慢慢“旧”下去，就作个价“卖”给你。我们的房子是百年老屋，四壁露风，冬天烧蜂窝煤根本不管事。母亲得脑血栓是怕冷的，同时小便失禁，经常要在蜂窝煤炉上烤尿片。怎么烤呢？先是在房子里拉了几根铁丝，把不同颜色的旧布尿片（用破床单撕成的）就挂在上边，很像迎宾时重要场所挂起的两国国旗。有时嫌尿片干得慢，就又托人用粗铁丝“幹”了一个巨大的笼子，可以直接摆在蜂窝煤炉之上，让尿片距离煤球炉子有半尺远。这样，尿片上的水慢慢蒸发，在屋子里就能看得见水汽，但那股味儿实在也令人作呕。这样，屋中横挂的铁丝废置不用了，久而久之，蜘蛛在那上边结了网。

有父母昔日的老朋友来家里探视，先是同情，后是摇头。后来有人悄悄跟我说：“不能想点办法么？”

想什么办法?当时国家百废待兴,需要落实政策的事情一大堆,领导上都忙。能做的“也算是”都做了。还能怎么办呢?

“要知道,你母亲可不是一般的司局级干部哪!……”

老朋友说了许多母亲昔日的文笔上的事儿。对此,我当然不否认。因为从我小时,就亲眼看见过母亲如何写文章。那都是在晚上,家里吃过晚饭,母亲回到办公桌跟前,点上一枝烟——她平时不抽,此刻也不真抽——只是让烟雾在眼前盘旋一阵儿。然后把烟往烟缸里一放,就抓起钢笔在稿纸上旋转起来。母亲的字不好认,每根笔道都是圆的,也都如同木匠刨子里飞刨花那样“飞”出来的。从晚上七八点一般“飞”到午夜十二点一点的,大约五六千字的稿子就成了。基本上一遍成,没过几天就在报刊上发表了。1957年之后,她被废止了写作的权利,这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当然,在此期间她没少写信,她的信写得极好,而且提笔就写,还是如同飞刨花,想从哪儿起就哪儿起,想从哪儿结就哪儿结。但是,写信和写文章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在她“改正”之后,尽管许多朋友一再劝她,但她依然不肯动笔。唯一的例外是上海《文汇丛刊》的老朋友谢蔚明约她写浦熙修,她没有婉拒,但一直没动笔。最后谢蔚明电报打到了家里,她这才急了,又是在一个晚上给“突击”了出来。她写完,要我帮助抄一下。我一读,发现文章是“一块、一块”的,已不如当年那样一气呵成。但其中有些片段确实是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于是,我稍稍在文字上给予连缀,抄写清楚了就发了出去。题目是《熙修和我》。

文章发表后,一片“宝刀不老”的赞誉之声。别人再让她写时,她就挥了挥手:“写不动了,写不了啦……”后来,浦熙修追悼会在政协礼堂举行。其时母亲已然躺倒,追悼会是父亲和我去了。会后,浦的女儿和我们同车回到家里,浦的女儿来到母亲床前,一声“伯母”还没叫完,本来口齿已然不清的母亲,这时却忽然清晰地说出“你妈妈的会,我也没能去……”随即号啕大哭。哭过之后,语言便不清起来。我目睹这一幕,才得知母

亲这篇不得不写的文章，不是用笔墨写出来的，而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她和浦熙修——这对被徐铸成老人誉为“重庆时代新闻战线上的一对姐妹花”——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比寻常的啊。

父母的老朋友悄悄出了个主意——要我帮母亲整理几篇文章，“这是让你妈妈重新亮相的唯一机会了。”如果文章能发出去——让她当年的老读者，也知道这个人还在；也让政协机关乃至咱们的领导层，还知道当年那个名记者还活着……

当时，我已经开始在报刊写点小文章了。于是，我抓住母亲在养病期间的点滴感受，将之连缀成文，就陆续投寄给熟悉的报刊发表了。当时，我也辅助三家出版社出我母亲的文集。我熟读了其中的文章，理清了我母亲的思路和文风。我就把她这个“人”超越时空“摆”在医院或家庭的环境中，让“她”受到刺激，推导她此际应该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文章发表时，每篇都有“病床口述 徐城北整理”字样跟在文章最后。

其中第一篇《人之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从发表的第三天开始，政协就有领导同志到家里探望，据说邓大姐在中南海里看到文章，发了话。领导都出了面，机关干部还不跟着上？于是，以后许多事儿相对好办了。我趁热打铁，又有《探监》、《塑像》和《葵瓜子》多篇。我写得并不急，要等前一篇基本“凉”了再写下一篇。每篇多是一千多字。新闻记者么，就是写千字文的么，但千字文与千字文不同，写作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我这样写了两三年就停住笔，一是父亲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机关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也多少对母亲要“照顾”些；二是母亲意识能力日弱，再写就不“像”了；三是我自己的工作上了轨道，有再多的精力也不够用了。